

● 世界政坛风云人物传记丛书

阿拉法特传

[英]阿兰·哈特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Arafat

© 1989 by Alan Hart

© 1996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时代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安排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国际)授权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阿拉法特传

作 者:阿兰·哈特

责任编辑:李 杰

责任校对:王旭伟

装帧设计:章桂征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458 千字

印 张:18

版 次:199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8 000 册

书 号:ISBN 7-5387-1077-9/I·1034

定 价:24.00 元





1952年末，23岁的学生领袖阿拉法特（右）向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呈交用鲜血署名的请愿书。



1967年6月“六天战争”之后，阿拉法特同埃及总统纳赛尔首次会晤。



阿拉法特和侯赛因国王



1983年12月阿布·杰哈德和乌姆·杰哈德撤离特里波利。



阿拉法特和孩子们在一起



一杯蜜糖水
是阿拉法特享受的小小奢侈品



1982年夏贝鲁特被围困期间，阿拉法特沉思军事败北。

第四版序言

对过去40年中绝大多数时日来说，关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知情的和理智的公开讨论及研究如何结束这场冲突，是不可能的。这里的问题，总起来说，是北美和西欧的主要宣传媒介和大的出版社封锁这类情况，以色列的绝对支持者认为这种情况给予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存在和要求以合法性。在这篇简短的序言里，我要扼要说明，为什么这种保持缄默的密约必须被打破。

在缺乏通过谈判结束阿以冲突的情况下——条件是将满足以色列的真正安全需要和巴勒斯坦人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实现自决的合法要求——中东是一个正在俟机发生爆炸的地区。一些专家认为这一地区的末日是可预见的，但仍可防止，其情景的轮廓如下：

以色列拒绝从它在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几乎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出。这种撤出是联合国安理会242号决议的文字和精神所要求的。而在阿拉伯方面，对于以色列能被说服同意以土地换取和平的信念彻底消失。在阿拉伯世界的一场剧变，表现为现存阿拉伯制度（它曾长期准备谋求一项同以色列的体面的和解）的推翻和它由革命的政权所取代，这些革命的政权将准备采用一切手段和不惜任何代价对抗这个犹太国。

1971年，果尔达·梅厄在我为英国广播公司全景节目准备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谈到这个题目，即以以色列如果在战场上面临某种失败，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她说的话促使我提出下面补充的问题：“总理，你是在说，以色列将准备把这个地区甚至把整个世界同它一起砸得粉碎吗？”她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是的，这就是我

正在说的确切的意思。”在这次采访节目播出的第二天，伦敦《泰晤士报》社论力劝它的读者们赞同梅厄夫人所陈述的任何未来的以色列政府在一个末日到来的情况下会怎样作出反应……报以一个核的玛萨达^①。

地区大战的前景，正在成为在北美、西欧（无疑的也在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和苏联）的讨论会上进行议论的一个重要的主题。真正的专家们似乎同意，如果以色列使用它的核武器，大概将会有不下于4 000万阿拉伯人被杀害。但是，这个状况和犹太国的消失很可能仅仅是全球性灾难的开始。即使两个超级大国能够避免陷入最后一轮冲突，在中东的这样一场爆炸的后果不会局限于这一地区。随着失去阿拉伯的石油、贸易和金融，全球的经济将会遭受一种打击，各地的政治和社会体系将会瘫痪。在一种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当领导人力图维持一个表面的秩序时，在西方被认为的民主将会被独裁主义所代替。在某种情况下，世界会需要一个替罪羊，会出现反对各地犹太人的另一个巨大的转折。

我试图在这一序言中提出一个非常简明的论点，这就是，在地球行星上的每一个男人、妇女和儿童都与在中东正在发生的事情利害攸关。冒着作为一个危言耸听者被打发的危险，我已经提醒人们注意在这一地区一场爆炸可能产生的后果，目的是强调对通向和平之路——在它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太迟之前——进行理智的讨论的紧迫需要。而要举行这样一种讨论，除非公众舆论，特别是在美国的公众舆论，对亚西尔·阿拉法特有较好的了解：他是谁，他真正地代表着什么，他曾经如何冒着他的信誉和生命危险使他的人民准备接受这不可思议的事——同以色列和解；还有，最为重要的，只要犹太国和它的美国盟友允许他这样做，他会以和平的名义提供些什么。

^① 玛萨达（Masada），希伯来语，地名。它以巴勒斯坦靠近死海的一片岩石命名。犹太一教派的信徒在这里对罗马人进行最后的抵抗。——译注

导 言

这本书介绍同一名字的两个人的故事。一个是以色列神话中的人物亚西尔·阿拉法特，另一个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活生生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

按照以色列官方看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暗杀者的辛迪加”，其领袖是一个“心怀无穷仇恨”的人，如果给他机会，他会试图来完成阿道夫·希特勒所开始的事业。这就是以色列历届政府及其辩护士们告诉以色列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故事。上述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描述，出自以色列政府官方发言人之口，当时格纳赫姆·贝京任政府总理。对阿拉法特的描述则出自贝京先生的继任者伊扎克·沙米尔之口。

本书试图从另一方面来叙述这一史实，同时提出三个论断。这些论断必然会引起许多尖锐的争论。

第一个论断是，在政治解决的可能范围内，没有一位阿拉伯或犹太领导人，像阿拉法特那样做了那么多事情，为全面解决阿以冲突准备基础。

第二个论断是，阿拉法特曾表示，他要劝说他的同事和人民，为取得同以色列的和平相处，为帮助巴勒斯坦人民获得具体的实际利益，而作出一些非同寻常的让步。如果当时以色列有一位老练的、有胆识的领袖能作出相应的反应，那么，1980年就会得到全面解决，甚至更快些。

第三个论断是，尽管阿拉法特已难以向其日益失望的人民证实政治解决和妥协能够取得成果，但阿拉法特仍不失为阿拉伯方

面掌握和平钥匙的人。在最近的将来的问题是，西方世界的政府，特别是华盛顿政府，能否明智地帮助阿拉法特使用这把钥匙而不是迫使他扔掉钥匙。

我希望支持这三个结论的根据，将有助于推动寻求中东和平途径的更有知识和更为诚实的讨论，而不要等到对我们大家来说都为时太晚的时候。

显然，阿拉法特仍然是那些自称是他的朋友以及他的敌人的主要暗杀目标，因而有些读者很自然地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的出版者就曾问过，为什么阿拉法特允许我这么接近他，甚至密切到让我了解他过去的秘密以及他的组织的内幕？

回答是很直率的，但要书写成文字却非易事。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倡议写这本书的是我，别无他人。我花了两年时间来说服阿拉法特，请他腾出足够的时间并给予我信任，使我能写成这本书。即使这样，如果没有他的三位最高级的同事——阿布·杰哈德、哈拉德·喻桑和阿布·伊亚德的协助，我也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我努力说服他们，早就应该有一本既有情况而又真实的关于阿拉法特的书，正是他们使我能接近阿拉法特。

为什么阿拉法特允许我这么接近他，对这一特殊问题的答案有两个方面，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的。第一方面是，在我和他身上所发生的神奇的变化。真正的阿拉法特是一个非常热情、富有感情的人，这同对他的宣传形象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我为他的许多突出的富有人性的品德所吸引。我感到正是由于他的这些品德，使他变得脆弱。我倒不是说他容易受骗，而是说他容易被伤害。阿拉法特发现我愿以虚心的态度来研究他及他的事业。我认为，他一开始就被我的真诚所感动。我曾告诉他，我有一些好朋友，他们不只是犹太人，还是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有两位是国防部长。我还告诉他，我和果尔达·梅厄之间有过很好的关系，当时她是以色列总理。为此，我得了一个绰号——“果尔达的男朋友”。这是因为每当我会见她之前，我总要先送她一束红玫

瑰。

关于答案的第二方面，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主要事实如下：1979年底，在我产生写这本书的念头之前，我曾专心致力于一项非正式的、但是最高级别的中东和平计划。我的使命是在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一方和以色列的某些领导人一方之间，开辟并在随后保持一条秘密联系渠道。在以色列这方密谋和平的关键人物，是贝京先生所控制的联合政府的主要对手——工党的领导人。

我的用意是利用这一秘密渠道，向那些一旦执政即有可能积极响应的以色列人，转达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准备政治和解的意向。我的计划得到一位最开明的散居在外的犹太领导人及其友人的资助。当时离以色列下届大选还有12~18个月，但没有想到贝京会竞选连任。他一上任，我的计划就告吹了。在贝京统治下的以色列，就连想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和解的念头，也被看成是叛逆。

尽管在我原先为独立电视新闻社和随后为英国广播公司全景节目写报道的日子里，曾有多次机会见过亚西尔·阿拉法特，但只是由于和平计划才使我对他有更好的了解，而他也决心给我以一定信任。

当和平计划夭折后，我才研究并决定写这本书。这一计划流产是个悲剧，因为我们确已取得一些坚实进展。在我第二次穿梭会见阿拉法特后，一位以色列人士对我说，“我们正使生米成为熟饭。”假如贝京不连任，那么以色列工党政府有很大可能授权和阿拉法特进行秘密的、直接的谈话。如果那样，历史的进程将会改变。

我把写作此书看成是我本人对和平进程所作的微薄贡献的继续。我要表明，我是作为巴勒斯坦和犹太人的真诚朋友而写这本书的。我对这两个民族都怀有深厚的爱。

一般说来，犹太人可以被看作是西方文明中的知识精华。同

样毫无疑问，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世界的知识精华。这两个来自各种族融合地区的人民，生活在和平相互协调之中，将会使这一地区得到更好的变化和发展，并且也将给全世界带来希望和鼓舞。

要取得和平，以色列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应该得到最基本的公正和待遇——历史的、合法的和道义的权利。这种公正待遇至少应该保证巴勒斯坦人民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家园的权利。必须指出，按照这一方案，在协商进程结束时，巴勒斯坦人民应该承认以色列，其代价是取得原曾属于他们的全部土地的不到30%。同意这一方案，以色列应放弃它在国际关系中信奉的首要准则：强权即公理，而正义只是强权者空口说说的抽象概念。正是由于一些强国的领导人和政府，在各国和各国人民中制造了一个没有正义的世界，致使我们这些20世纪后期的人类，行走在灾难的旅程中。这就是我所说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生活在和平和相互协调之中，将会给世界带来新的希望和鼓舞的含义。当公理战胜强权得以证实的时候，那么最棘手的问题也会得到解决。

以色列首届总理戴维·本·古里安曾说，犹太人“只有保持他们的道德、精神和知识水平”才能得以生存。今天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认为西·古里安所描绘的他们的生存途径，已被近几届政府置于危险的境地，他们的行动是对全体犹太人的道德准则和价值的一种讽刺。因此，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以色列愿意放弃信奉强权即公理，那么它必将得益甚多，同时也有益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197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约旦被击溃，此后它使用了恐怖武器以表明巴勒斯坦事业继续存在。阿拉法特发出许多信号中的第一个信号，即表明他决心劝说解放运动面对现实（即以色列得以在1967年前的边界内生存）作出让步。从那时起，在巴勒斯坦方面，阿拉法特即以和平缔造者的姿态出现。阿拉法特需要以

色列方面在政治上予以相应的反响，至少在原则上应接受巴勒斯坦人民自决的权利。每当阿拉法特朝着和解方向采取政治行动时，以色列却报以枪弹和炮轰。阿拉法特表明他希望政治和解的意愿越多，以色列就越加变得决心摧毁巴勒斯坦政治力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顺便还要说说，以色列的政界和军界领袖们从未真正把巴解组织视为严重的军事威胁。在这一敏感问题上，有资格作权威性发言的人就是布赖恩·厄克特。多年前他曾是联合国副秘书长，不久就退休了。在其任职时，他的实际权力仅次于四位秘书长。他主要在幕后活动，是联合国主管处理危机的负责人，擅长于中东事务。在外交界，他被称为“中东先生”。很难想象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能成为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卓著专家。作为外交家，厄克特坦率得令人惊讶，并使人耳目一新。据我所知，他是唯一不为梅纳赫姆·贝京威胁所吓倒的非犹太人。在一次庆典场合，他刚刚从贝鲁特会见阿拉法特后来到耶路撒冷总理办公室，贝京指责厄克特，并告诉他以后不许再与阿拉法特谈话。厄克特答道：“总理先生，我是国际社会的公仆。你竟然教训我能同谁和不能同谁谈话，难道不感到太过分了吗？”当然，贝京以后再也没有提起此事。

关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以色列构成军事威胁的说法，厄克特说：“以色列有制造神话的才能，并使世人当成真理来接受。他们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一种军事力量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这是一个大神话。事实不是这样。他们可以像对待双手被缚在背后的人那样来对待作为军事力量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色列真正害怕的是一个政治性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1974年以来，以色列拒不采用外交办法来考察和对待现实及阿拉法特的政治和解主张。这是实现中东和平的主要障碍，也是继续进行屠杀使这一地区长期浸于血泊之中的主要原因。

1974年阿拉法特开始进行一项危险的任务，即说服巴勒斯坦

解放组织面对以色列存在的现实并认识实行和解的需要，自此以来，历届以色列政府都拒绝考虑即使是让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微型国家的想法。它们认为这样的国家将对以色列的安全和西方国家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构成威胁。以色列的这种奇特断言，过去和现在都是没有根据的，而亨利·基辛格却成了其学舌者。

在我执行我的中东和平计划期间，我发现，在以色列政治、军事、情报部门有数量惊人的并在日益增长的最高级领导人，私下都表示，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小型国家不会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难以对付的威胁。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将举出他们中的一位，即陆军少将施罗莫·盖西特。我之选中他，可以这么说：他大概是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对以色列形成军事威胁这一问题上的唯一最知情的以色列人。

盖西特任军事情报署研究室主任多年。在这个岗位上，加上他能从莫萨德—以色列中央情报安全局那里获得有关的情报和消息，他可能比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更了解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他曾短期担任1967年以色列所占领土军事长官。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事与愿违，他被委任为军事情报局局长。他接受的任务是不仅要管理这个机构，而且要改组它，以便这类失误不再发生，即对以色列未能预料到1973年战争的部分指责。对盖西特来说，在以色列政治、军事、情报机构需要帮助时，显现出此人的素质、能力及判断力。以自己不了解情况为理由，轻易排斥一个人的深思熟虑的意见，是愚蠢的。

在我同盖西特的一次谈话中，他的一段评论对这本书很有启示。他说：“我们以色列人的困难是，我们已成为自己宣传的牺牲品。”盖西特的评论的含义是指责历届以色列政府，在关于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对犹太国家军事威胁的实质问题上，欺骗了自己的人民和世界上很多的人们。我相信，同熟谙内情的一些以色列人一起，通过对全部有关情报进行诚实、客观的研究，盖西特的指控即可得到证实。除了1948年的几个星期，当时新生的犹太国正为

其生存而战斗，以色列从未有过被阿拉伯和巴勒斯坦联合军事力量在战争中被击败的危险。

1967年的“六天战争”，是对历届以色列政府如何掩盖事实真相以便煽起大规模的、言过其实的对阿拉伯军事力量恐惧的最好证明。1967年战争前和战争期间我在以色列，我可以证实当时以色列人完全地、真正地相信他们将受到阿拉伯人的进攻。他们所能获悉的所有消息和证据，证明他们的恐惧是有道理的。阿拉伯前线国家埃及、叙利亚、约旦的军队已经动员起来；阿拉伯世界官方电台接二连三地渲染犹太国很快要被“毁灭”。但是以色列军方及政界领导人知道埃及总统纳赛尔无意进攻，而是在玩弄唬人的花招。事实上是以色列人帮助设计了这一圈套，使纳赛尔陷进去了。

这次战争对所有阿拉伯人是不堪设想的耻辱，也给阿拉法特一个机会，得以在被战败的阿拉伯国家带有一定勉强的支持下，发动反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军事行动。战后不久，一位以色列前军事情报局局长告诉我，如果不是纳赛尔给以色列进攻阿拉伯以借口，那么以色列将会另找理由制造“6至10个月之内”的战争。因为其军事策划者们认定，袭击苏联装备的大量阿拉伯装甲部队的时机已经到来。数月之后，事情就表达得更明白了，一位身分不亚于伊扎克·拉宾的人公开确认，以色列知道纳赛尔是在唬人。拉宾作为参谋长为以色列策划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之后，他接替果尔达·梅厄担任总理。1968年2月，拉宾在致《世界报》的一份声明中也十分坦率地承认：“我们知道纳赛尔不想进攻。”

作为以色列人受自己政府洗脑的结果，包括经常放映大屠杀的影片，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对阿拉伯人怀有恐惧。鉴于犹太人的历史，也鉴于以前阿拉伯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威胁，这种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的恐惧缺乏真实基础，当冲突的客观事实经过理智思考检验后，就会显示出这点。看来明显的结论是：唯有以色列人民不再做他们自己宣传的牺牲品时，和平才有可能。

如果这本书有助于打开某些以色列人的眼界，我的劳动将是值得的。

阿拉法特及其同事们没有给我的工作以捷径。他们不曾说过：“来，请坐下，我们已准备好向你披露我们的秘密。”从开始起我能获得多少内幕情况，依靠的是两件东西。一是我同他们交谈的能力，二是我询问的质量。当我得到线索时，常常比我得到对在某一危机特定时刻真实发生的一切详细介绍更为满意。此时，我必须运用自己的判断，以得出2加2等于4的正确结论。

这本书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阿拉法特其人及其事业”，以如实介绍作为当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的传略开始，随后简要叙述为什么会出现巴勒斯坦问题。为了帮助广大读者理解阿拉法特斗争的真实性质，我把焦点集中在一个几乎从未被人问及的问题上——为什么要建立以色列国？正如巴勒斯坦人所说，这是一个奇妙的问题，而这问题正是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核心。

第二部分，“地下年代”，叙述阿拉法特的早年生活，他与阿拉伯前线国家情报机构的冲突，他和其他人一起着手建立地下基层组织网，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立的解放组织。阿拉伯前线国家方面不希望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复兴。通常并不明言的事实是，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无意同以色列战斗以解放巴勒斯坦，无论他们在公开场合下，讲得如何与此不同。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在地下年代，另一个矛盾是发生在阿拉法特和法塔赫集体领导中不同意其军事战略的多数同事之间。阿拉法特是真正相信巴勒斯坦可以通过武装斗争得到解放吗？如果不是，那么为什么他坚持采取军事行动，又怎么能在将其意志影响他人方面取得成功？

第三部分，“斗争”，这是一部英雄史诗。叙述阿拉法特如何没有用许多场战斗去解放巴勒斯坦，而是更多地用于保持巴勒斯坦事业的存在。首先是阿拉伯国家，然后是以色列，都力图取消巴勒斯坦事业。在这些年头里，阿拉法特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

要判断什么时候超级大国是他的敌人，什么时候又成了朋友。这里也有关于阿拉法特领导能力的传奇故事，即他如何说服他的绝大多数同事和人民，为了同以色列达成妥协性的和平和为巴勒斯坦人民取得某些实际利益而作出难以想象的让步。

我所要研究和写作的是一部阿拉法特的传记。在这里，可以这么说，我是想以人的故事来统率政治上的戏剧性事件和行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失败了。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如果不时常停下来解释阿拉伯国家内部和国际政治中的复杂情况——而这些情况又是他必须掌握的——那么就完全不可能弄懂阿拉法特的用意。我认为就是这些必须的注意力的转移，为整个故事增添了实质内容。我希望他们将能使本书读者不仅理解阿拉法特斗争的实质，而且理解为什么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希望的象征，至少是衡量正义的尺度，仅仅他的存在，迄今为止就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惊人的成就。有一次在白宫的草坪上，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对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说，在政治上生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从这点来看，并且考虑到不利形势，可以这样说，阿拉法特是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幸存者。如果他不是巴勒斯坦人，我想犹太人将第一个向他致敬。

为了方便不熟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及巴勒斯坦各组织名称的读者，我在书后附了一份主要人物及组织的名单。

在寻求中东和平道路上，此书如能有助于促进进一步了解情况和更为真诚的讨论，那要充分感谢所有那些给了我时间、信任和友谊的巴勒斯坦朋友们。

我还必需感谢两个人，没有他们，我就不能完成此书的写作。第一个是我的银行经理，他允许我为了旅行、工作和生活得以大量透支。第二个人是我的妻子尼科尔，她支持甚至鼓励我决定以我们的住房作为透支的抵押。她是我调研的助手和图书管理员。她将谈话录音复写成文字，这些谈话录音带提供了主要资料来源。她为我最后的手稿打字。通常情况下，我应该将此书首先奉献给她，